

外国教育史和外国教育

滕大春

河北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 朱文富

封面设计 张志伟

外国教育史和外国教育

滕大春

※

河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保定合作路4号河北大学院内)

邮政编码 071002 电话 5018523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0.25 字数 470千字

1998年3月第1版 1998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册

ISBN7-81028-425-8/G·246

定价 30.00元(平)

35.00元(精)

前 言

近世以来,考古发掘日盛,文献钻研日广,国际学术交流日繁,一座高大雄伟的研究人类教育史的巨厦和一条宽阔雄壮的发展比较教育学的桥梁,正在腾空而起。我在教学和科研的过程中,积累了一定数量的文稿,一般都是经过审慎探讨和思维的产物,其中除少数篇外,余者已经在书刊发表。各篇所论多涉及近年同志们关于外国教育史和比较教育的议题,略能反映我国教育专业迈进的一二。为着便于查阅,全书分为四部分:一是外国教育史和外国教育,二是美国教育史和美国教育,三是外国教育史和比较教育,四是附载,所载系解放初期以马列主义立场观点批判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尝试之作。

在此须略加说明的是,过去的外国教育史大都陷于欧洲中心论,把重点放在希腊、罗马以及欧美少量文教兴盛的国家。实际上,根据各地的发掘和调查,古代东方文明古国的教育发达不但早于西方,其教育内容和方式、方法也和西方国家是同样丰富而优美的。忽视古代东方诸国的教育演变而仅事西方教育的陈述,是不能窥及古代教育的全貌的。我曾对东方诸国的教育史试作初步涉猎,对于两河流域的亚述和巴比伦的教育、尼罗河流域埃及的教育、印度的教育、希伯来的教育、伊斯兰国家的教育等,都曾粗略论述,以补过去外国教育史教材之不足。再则,美国的历史仅三百余年,而竟然后者居上,成为当前教育发达国家,因而比较明显地揭示了教育发展应遵循的客观规律。我对此也进行了初步探究,希

望能摸索到发展教育事业的捷径。这两点是我年来所致力,因此便把多篇选入本册。但由于学力水平所限,错谬之处,敬祈教正。

目 录

一、外国教育史和外国教育

- 关于两河流域古代学校的考古发掘..... (3)
- 古代埃及的教育..... (18)
- 古代印度的教育..... (42)
- 古代希伯来的教育..... (68)
- 古代伊斯兰国家的教育..... (90)
- 柏拉图的《理想国》及其教育理论初探..... (122)
- 卢梭和他的《爱弥儿》..... (155)
- 卢梭的天性哲学和它的历史意义..... (183)
- 卢梭——教学论发展史上的丰碑..... (205)
- 裴斯泰洛齐为教育而奉献的爱心..... (230)
- 从比较教育观点评费希特在教育史中的贡献..... (242)
- 英国怎样办好大学本科教育..... (257)
- 英国大学的领导和管理..... (270)
- 英国的重点中学——公学..... (281)
- 由学术观点谈大学教育..... (297)
- 《外国教育通史》结语..... (317)

二、美国教育史和美国教育

- 战后美国教育史界的流派和论战..... (337)
- 美国建国初期冲破禁区的教育革新运动..... (354)

战后美国教育的改革.....	(364)
战后美国高等院校的发展方向问题.....	(375)
美国战后高等教育大众化问题.....	(384)
美国高等院校的科学研究和教学改革.....	(395)
美国大学“教授治校”评介.....	(404)
美国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历史经验.....	(412)
美国中学的转变.....	(424)
美国师范教育的改革.....	(428)
美国师范教育的历史、现状和展望	(436)
美国中小学师资问题的严重及其成因.....	(448)
美国是怎样向外国教育学习的.....	(458)
美国黑人教育的演变和展望.....	(468)
杜威和他的《民主主义与教育》.....	(485)
美国教育史显示的教育发展客观规律.....	(521)
三、外国教育史和比较教育	
《教育史研究》创刊号祝词.....	(533)
试论《外国教育史》的学科体系和教材建设.....	(536)
外国教育史教材建设的回顾与展望.....	(547)
试谈外国教育史的“古为今用”和“洋为中用”.....	(554)
试论“比较教育”和“洋为中用”.....	(569)
迎接二十一世纪的比较教育.....	(578)
四、附载	
批判杜威的教育目的论.....	(585)
批判杜威的教学论.....	(608)
批判杜威关于道德教育的理论.....	(626)

一、外国教育史和外国教育

关于两河流域古代学校的考古发掘

研究教育史者总在推敲人类最古的学校产生在什么地方和什么年代？这些学校是谁设置的？它的情况怎样？古籍对此的记录一般都很简略，而且未可尽信，问题乃久悬未决。幸而近年考古发掘提供了探寻远古学校的资料。在这方面，两河流域是居于前列的。这个地区不但出土文物多，其久已无人通晓的苏美尔文，现已基本弄通，远古学校之谜随而得以慢慢解开。这是第二次大战后教育史界的大事。

早在 1899 年考古学家曾在底格里斯河上游的尼波尔(Nippur)发掘到二十片泥板书，当时无人认识苏美尔文，没认出这是一篇文章。经过十年钻研，始于 1909 年译出其中的一片。接着又经十余国学者通过四十年的琢磨，终于在 1949 年，苏美尔文竟完全被人认识了。恰巧后来陆续发掘的泥板书中存在着大量学校学生的作业和有关学校的记录。这才打开索解人类最初学校的大门。——本文愿对这意义重大的发现，略作介绍和阐述。

一、关于学校的设置、种类、组织、规模的探测

两河流域最早的学校产生于何时，是学者多年聚讼的课题。年来已能作出较有考古学根据的推测。1902 年到 1903 年，考古学家曾发掘出叔拉帕克(Shuruppak)城，城中有很多泥板书，颇像学校学生的作业，经鉴定是公元前 2,500 年左右的遗物。有人由于巴比伦在那时逐渐成为具有权势的国家，估计学校出现在那时。

另外,法国考古学家帕拉(Andre Parrot)于三十年代在两河上游的马里(Mari)城,发掘出一所估计为公元前2,100年左右的学校。它包括一条通道和两间房屋,大间房屋长44呎,宽25呎;小间面积为大间的三分之一。大间排列着四排石凳,每条可坐一人、二人或四人,共容四十五人;小房排着三排石凳,共可容二十三人,很似学校课室。两房四壁无窗,从房顶射入光线。房中没有讲课的讲台或讲桌,却放着许多学生的作业泥板。墙壁四周的底部安放着盛有泥土的浅浅水槽,好似是准备制作书写用的泥板的。附近摆着一个椭圆形的陶盆,可能是储放清水以便和泥制造泥板的,或则是放置书写用具的。地面上装点有很多亮壳,好似是教授计算的教具。这所房舍靠近皇宫,不靠近寺庙,刚好别处发掘的泥板书的储存场所也是近宫而不邻寺的;有人推断这是古时的学校。还有人推断这所校舍是公元前三千五百年建筑,代表人类最先出现的学校,比埃及于公元前二千五百年产生宫庭学校早一千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具体说,从1949年以来,学者们更从苏美尔文献中看到许多关于学校的叙述,对于远古学校问题的解决,大有帮助。例如,在尼波儿城发掘的泥板书中有称道帝王振兴教育的赞歌。作者自称:“我从幼年起就进入学校,利用苏美尔文的泥板书,学习文士的艺术。在所有的青年中,我比别人善于书写;在智慧的圣地,人们练习文士的本领;我擅长加减计算以及财政会计”。又如,在出土的家长给教师和教师给学生的信中,也明确地提到学校称学校为“泥板书舍”。有的书信形容学校外临市街,有学生出入的大门,还有校舍供帝王对学生问询和考试之用。另外,有的文献还说:“闭着眼睛走进去,睁着眼睛走出来,解决之道在于学校”。意思是学校能把愚昧无知、不识文字的人,造就成为聪明智慧、知文识字的人。因此种种,美国密苏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卢卡士(Christopher G. Lucas)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文士

学校》一文中说：“现在发现的古代学校教科书和其他考古发掘到的文物，都说明至迟在古巴比伦王国时期（约当公元前2000年左右），两河流域就诞生了学校；而且很可能比这早数世纪已有学校存在于该地。毫无疑问，约当公元前十八世纪中叶，即汉莫拉比统治时期，培养文士的学校已盛行于全境，即从现在巴格达向东南方向伸展，直到沙特阿拉伯为止，学校都出现了”。（*History of Education Quarterly*, Fall, 1979）。卢卡士的结论可以说是最新的结论。

学者们于考证学校年代之外，还将两河流域陆续发掘的古代学校遗址分为三类。考古家在拉沙（Larsa），即今桑卡拉（Sankala），挖掘出一所学校，邻近皇宫。与此相似，在乌鲁克（Uruk），即今瓦卡（Warka），也发掘大量泥板书存在于皇宫的废墟中。上述马里城的学校也靠近皇宫而非紧临寺庙。这类学校似乎是宫庭或政府机关设立的。其次，在沙杜蓬（Saduppuan），即今哈卖（Tell Abu Harmal），发掘出辞典和文学课本，都埋在尼沙巴（Nisaba）和她的爱人哈加（Haja）的寺庙地下。这类学校似乎是寺庙设立的。在克什（Kish），即今阿拉海末（Alhaimir），挖到的校舍紧临文士住区。与此相似，在尼波儿发掘的学校用泥板书，是从文士所居的山上出土的，它们包括丰富多样的练习作业、文学作品和参考书。另外，在乌尔（ur），即今穆克斯耶（Muksyyer），发掘一所房舍，内藏约三千片小型的学校课本泥板书，还有宗教著作、文学作品和教材纲目之类。该房既不靠王宫，又不临寺庙，似乎也是文士私立的学校。据学者们推测，上述三类学校很可能是同时并存的，特别是在巴比伦古王国时期。

究竟三类学校以哪类最为兴盛，尚难确断；不过，有些考古学家认为比较发达的是由僧侣主持的寺庙学校。归纳他们的理由，不外三者。首先，亚述、巴比伦是文明古国。它们因底格里斯和幼

发拉底斯两河流灌,农业发达,地处东西交通要冲,商业繁荣;巴比伦当公元前十八世纪的汉莫拉比统治时期,亚述当公元前八世纪萨尔恭王二世统治时期,新巴比伦于公元前七世纪尼布甲尼萨二世统治时期,都是国势鼎盛年代;因此,在天文学、数学等科学方面,在建筑、水利等技术方面,在雕刻艺术以及文学方面,成就辉煌,以致拥有“天文学和数学之父”的美名。这些被奉为人类早期文化的宝藏,都掌理于寺庙之手。当时把知识视为神赐,非僧侣不敢享有,传习这些知识也是僧侣的特权。其次,古代两河流域的人民的的生活都受寺庙的支配,政府很少出面管理。寺庙不仅是宗教生活的园地,而且是经济体制中的重要环节。它负责观察天象、指导灌溉、管理农耕、发展商业、兴建工程和处理政府档案等,职权既繁,影响又广。在汉莫拉比时期,寺庙遂建得宏伟美观。国王自称为敬奉神灵的高僧,《汉莫拉比法典》就是假托日神而制定的。法典全文三百条都刻在闪绿的丰碑上,碑石刻有美丽壮观的浮雕,形容日神授予法典的神情。国王之下,又分高僧为四级,最高级的叫山固(Shangu),负庙宇监督的重任;另三级则为占卜僧(Baru)、歌咏僧(Kalu)和驱妖僧(Ashipu)。不待言,寺庙更是人民意识形态的塑造者和控制者。在这种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结构之下,宗教在教育事业上占有绝对的优越地位。

学者还举例道,亚述王阿寿奔尼波(约当公元前669—626年)在尼尼微建立的图书馆,藏有约计三万件泥板书,这是他下令搜集而来的。之后,亚述学者曾对此作过整理,并译成通用语文。当时的楔形文字极难掌握,从事这项繁巨的搜集、整理和翻译事务,必须靠大量的学者,而培养偌大一批文人,显然非较大的学校莫办。而且,根据发掘的资料,并不只尼尼微城设图书馆,一般城市都有。太罗城(Tello)的图书馆藏泥板书三万件,尼波儿城图书馆同样藏泥板书约二万件。这些图书馆与观象台一样,都设于寺庙之中,寺

庙便不啻文化重镇。举凡天文学、数学、医学、建筑学的知识,皆操之于僧侣。由僧侣培养各项业务接班人既符合客观需要,也比别处便利。有的学者还发现僧侣们曾以各种符号创制音阶表和单词表,绘制苏美尔文的语法解说,利用赞美诗、咒语、卜辞以及法律和历史的知识,指导学生从事语句练习;绘画山水鸟兽的图形,作为学生学习的佐助;还为进行道德教育,编撰有趣的神话和寓言。这些也是说明寺庙在教育方面作出的贡献。

在寺庙学校之外,还有希图充任政府官吏而学习书写的人,就学于精通书写的文士。这种文士常常在家中收徒教学,教师的子辈通常都就学于文士学校之中。和寺庙学校相比,寺院学校以培植政府的高级僚属为任务;文士学舍仅则培植低级人才。文士也称书写家,是国家和社会赖以执行政务和业务的人才。当时无论日常行政、经营商业或外邦往还,都靠文字作工具,文士成为不可缺少的力量。不过,一般书写家主要传授的是行政和司法工作中惯用的知识、来往函札的习作、书写各种字体的技术,与寺庙学校传授科学知识者不同。所以寺庙学校享受较高的声望。

最后,当时学校的规模有多大,怎样组织,文献中也屡屡述及。一般学校有校长、教师和学生。他们互称“同事”,自称为学校的成员。校长被尊为学校之父,是受师生敬仰的领袖。人们称颂他:“校长,你是塑造人性的上帝”。又说:“你是我敬仰的神。你将我这不懂事的孩子培养成有人性的人”。有的还写道:“他指导我的手在泥板上书写,教育我好好行事和谈论好的意见,教导我注视那些指示人们取得成就的规范”。校长造访学生家长时,总被安排在最荣誉的座位上。人们崇慕他为“伟大智慧和知识的化身,富有卓识的文士”。教师直译为“泥板书舍的书写者”。文献中曾载有“教授苏美尔文的教师”、“教授计算的教师”、“教授测量的教师”、“教授图画的教师”等名称。可能在某些大规模学校中,教师已经分科

任教了。文献还提僧侣、文士担任教师职务,是垄断文化的有学识有地位的人。文献还提在校长、教师之外,学校又设置监督直译为“泥板书舍的管理人”,属行政人员,非教学人员,职司维持学校秩序,还设图书馆员、学生出席检查员(负责考勤)、鞭责学生人员、校门看守人员,等等。这也反映当时有些学校的规模已经不小了。

就教师的组织而言。最初,有文化的僧侣才能称作文士。后来文士的需要量日增,寺庙僧侣不能满足需求,而且寺庙的收容量有限,大幅度扩充也不可能;再则,寺庙的宗教任务愈来愈多,工作的神秘性愈来愈浓,运用应用知识的人必须跳出这个圈子,因此种种,在僧侣文士之外,出现了不作僧侣的世俗文士。后者和前者都是当时教师队伍的成员,只是后者一般充任政府官吏和商业工作者,面向实际需要,在社会地位上不若僧侣文士。若和埃及古代相比,两河流域的文士则较为卑微,因为古埃及的文士常常成为贵人显宦,而两河流域的文士是莫能如此的。

二、关于教育培养的目标——“学为文士”

从考古发现的文献中,知道“学为文士”是受教育者的奋斗目标。文献写道:“从幼年起就进学校,利用苏美尔文泥板书,学习文士的艺术”。在这里,首应叙述文士的社会地位和所负职责。

按两河流域在公元前四千纪就已出现了苏美尔文化,那时人们凭口头传播伦理规范和民间故事。最早的巴比伦文化即导源于此,而亚述和巴比伦在文化上是密不可分的。后来手工业和商业发达,急切需要计算能力,便在发展计算和记数的过程中,产生了文字和泥板书。书写者将泥制成板状,再在泥板上书写文字,称泥板书。在出土的泥板书中,其内容多半都是账簿、契约、单据、法律条文、寺庙生产物品表。这时的文字是苏美尔人以象形为主的线体图形文,叫作苏美尔文。最初,苏美尔文是世俗应用的文字。约

当公元前 2500 年 ,阿克德人征服苏美尔人 ,阿克德文流行起来 ,苏美尔文乃只用于寺庙。慢慢地 ,苏美尔文变成了仅用于宗教的古典文 ,阿克德文变成了通用文字 ,古文和今文并存于世。寺庙僧侣为执行职务须操苏美尔文 ,高僧有较高文化 ,尤须熟练地掌握它 ,一般人却无法懂得。到后来 ,掌握这种古文便成了学术地位高的标志了。

历史向前发展 ,生产事业和政府事务纷繁起来 ,社会乃大量需要书写工作。寺庙中的任务既非僧侣所能全部承担 ,政府也在官员之外 ,需用众多知文善写的人 ,于是在僧侣文士之外出现了一般文士。少数水平高的文士被委派作官员 ,撰拟帝王旨意 ,制定军政法令 ,修订外交文书 ,编写政府报告 ,充当朝廷顾问 ,职位显跃 ,极受世人尊敬 ,通常称为高级文士。多数文士则充当公证人、掌印员、土地测量和登记员、军情记录员、牌坊石碑题字和雕刻员等等。这些职位卑微的官员通称低级文士。另外还有受私人雇用而服从于商业贸易的文士 ,称为缮写员、计算员、秘书、文牍员之类。当时无论公务和私务 ,都广泛使用文字 ,成了无文字即不能办事的情况。文士用场广 ,文士数量多 ,其作用就无孔不入了。卢卡士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文士学校》中说 :“文士在美索不达米亚发展中的重要性 ,无论怎样描绘 ,也是不算过分的”。文士既如此重要 ,一般想望仕进和出人头地的人 ,遂竭力谋取其位。“你们无法和我相比。我是苏美尔文士” ,是人们自傲的用语。“我是名符其实的文士 ,你不配称为文士” ,是文士相轻之词。家长关怀子辈前途 ,便千方百计要他们去学为文士。在考古发掘的泥板书中 ,有父亲训子的记录。他们说别人都叫子弟从事体力劳动 ;“我却叫你用执笔而不去用手耕田、掘地、辛苦工作”。别人叫子弟在幼小的年岁就靠劳力养家糊口 ;“我为了使你成才而终日受尽熬煎” ,其苦口婆心之情跃然纸上。这表明“学为文士”已蔚为社会风气。学者称

两河流域的古代学校为文士学校,是有道理的。

当时的学校既不造就一般人,仅是培养文士的场所,一般人也就不需要进学校。在社会急需文士的时期,文士学校稍有大众化的倾向;后来阶级和等级变得森严,则社会地位高者的子弟才得享受就学的机会,学校的门禁也森严起来。按巴比伦的记载,许多女子不仅知文识字,并且积极社会活动和经营商业。出土的契约和捐册中常有妇女签名。在西巴尔(Sippar)出土的文献中,还载有“妇女文士”的名称。但关于妇女入学校的问题,还没有发掘到有关资料。据学者推测,显露头角的妇女为数不多,或是中产以上家庭聘教师在家培养的结果。

三、关于文士教育的实施程序、课程、方法

正如学者称当时的学校为文士学校,他们称当时的教育为文士教育。在近年发掘出土和翻译成文的文献中,颇有涉及教育的论文。《恩奇曼西和吉尔尼沙的争执》(Disputation Between Emkimsi and Girmishag)、《学生》(School Boy)、《文士和他的不肖之子》(Scribe and His Depraved son),等等,提供了学校的概貌。

首先,文士教育分两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对一般学生传授基础知识,现在出土文物大都属于这一类。第二阶段是将意向不同的学生,分别派到适当的寺庙或政府机关,按其准备承担的职责,接受较高水平的定向培养,办法是通过师生传承的艺徒制或导师制。

初级阶段以教学苏美尔文和阿卡德文为主。古代东方国家,如中国、阿拉伯、波斯、土耳其等,都是古典文和通用文共存。欧洲国家兼重拉丁文和本国语,情况相同。两河流域也不例外。根据文献所载,教师须指导学生书写和阅读苏美尔文和阿克德文,练习苏文和阿文互译,而且书写重于阅读,古文重于今文。在巴比伦古

王国时期,古典文的重要性有下降之势,规定阿文教师名额应该增加,无奈,校长大都由苏文教师兼充,鄙薄不通古文的阿文教师,因而积习难改。谚语说:“不懂苏美尔文的文士,算得上什么文士!”由于“文士艺术”以书写为主体,教师遂把书写的过程严格预定出来。幼年儿童先应学习记忆和抄写基本音阶,然后练习拼音,再进一步则掌握词汇。学习拼音和词汇都离不开抄写。儿童最初学习抄写时,把泥加水,摊成略带凸状的椭圆形的、直径约二、三吋的泥板。教师先在泥板上写出范字,学生立即在泥板的另一边仿照书写。教师订正后,泥板随而揉毁成团,以便下次再用。随着学生学力增长,泥板面积扩大,便以五、六吋为直径了。现今发掘的泥板作业中,多是一边写着语法正确、字体美观的范字,一边是语法有错误的、不够美观的抄字,很可窥见当时的教学过程。

练习抄写的内容由简而繁,由易而难。最初练习抄写的文字是按生活需要而选的,可分为动物、国家、城市、矿石等类别。各类名词和成语之多,远远超出一般的意料。有人追忆道:“我从抄写伊南娜(Inanna)的名字起,一直抄到原野的兽类之名和各种工匠之名。在练习音阶、拼音和词组的抄写之后,即练习由上而下、由左而右地按行书写,难度也增加了。学生学习楔形文字本已不易,还要兼学古老的苏文和实用的阿文,而且侧重古文的抄写,就难上加难了。当时不但要求抄写得正确美观,还要求彻底理解。因此种种,便只好违反量力性原则。教师留给学生的作业量,往往超乎成年人负担的能力。由于生硬的教材和令人烦腻的教法,学生的学习质量是不佳的,以致不断听到:“某人难以掌握苏美尔文,因为他不能正确地运用舌头,”等等。恩奇曼西和吉尔尼沙便曾互相垢骂:“你已经会写泥板书了,但不能深解抄文的含义,你已经会书写信札了,但你只能如此而别无所能。”可见当时拔苗助长的教学是效率不高的。